

裴松之

《三国志注》研究

◎ 张宇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 华侨大学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项目资助（16SKBS109）

裴松之《三国志注》研究

张 宇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裴松之《三国志注》研究/张宇著. —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6. 7
ISBN 978-7-5607-5589-2

I. ①裴… II. 张①… III. ①中国历史—三国时代—纪传体②《三国志》—研究 IV. ①K236.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91742 号

责任编辑:刘森文

封面设计:张 荔

出版发行:山东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0 号

邮 编 250100

电 话 市场部(0531)88364466

经 销: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济南华林彩印有限公司

规 格: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6 印张 124 千字

版 次: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8.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前言

学术界关于裴松之《三国志注》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大体包括三类:一是关于裴注字数、引用书目、史料价值等历史文献学方面的研究;二是关于裴注的注史方式、史学思想、历史考证法等史学方面的研究;三是以裴松之《三国志注》作为基础,进而探讨魏晋时期史学变迁与社会变动之间关系的历史研究。以上三类研究分别从不同层次、不同方面入手,都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三类研究却鲜有涉及《三国志注》注文本身,或者最多是以裴松之的自注作为研究对象。事实上,目前关于《三国志注》注文的研究,包括注文体例、注释方法、注文中的历史评论与史学批评、注文中蕴含的历史倾向与特殊的论断方式等,似乎还处在一个较为薄弱的阶段。而这些研究,恰恰可以视为研究《三国志注》最为基础性的部分。

有鉴于此,本书在目前史学界研究的基础上,主要以《三国志注》的注文作为基本的研究对象,并以此为突破口,力求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进展:

第一,将裴松之注史之时的社会背景与长远的历史背景

相结合,探讨裴松之注释《三国志》的根本原因。长期以来关于裴松之注释《三国志》的原因,往往简单地被宋文帝“嫌其略”这三个字所概括。然而当我们细绎裴松之的《上三国志注表》,并且注意分析当时的社会背景和长远的历史背景,就会发现对这一说法其实存在着本末倒置的认识,真正的原因或许与长期以来类似三国鼎立局面不断出现的现象有关。

第二,具体分析《三国志注》的注文,探讨裴松之在注史过程中所运用的体例和方法,进而探讨裴松之对史注体自觉或不自觉的体系构建。裴松之在注史的过程中,并非将史料予以简单地添加而已,而是以“称谓”“编次”“自注”等一定的体例和“带注法”“类注法”“子孙附注法”等必要的方法为手段,将史料予以有目的的裁剪、排比、整理,以期达到“有所发明”的旨趣。

第三,《三国志注》中存在着数量较多的历史评论与史学批评,虽然较为分散零碎,但是若能予以串联勾勒,未尝不是吉光片羽。这些历史评论与史学批评,一部分是出自他的自注之中,还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对他人评论的引用。这些历史评论与史学批评,尽管零落分散,但是综合考察之后,还是可以感受到裴松之的史学有其体系化乃至系统化的一面,这也是我们直接考察裴松之史学观念与思想最为重要的方式。

第四,表微《三国志注》中所隐含的“尊魏抑晋”的历史倾向以及“寓论断于注释”的特殊论断方式。裴松之在注史过程中,更为注意的或许是前文所提到的“有所发明”。这些“发明”包括他在注文中所隐含的“尊魏抑晋”的历史倾向,以及通过层层递进、注评结合、两两对照等方法所表现出来的特殊论断方式。而这些“发明”在某种程度上也与当时深刻

的社会背景有着密切关系。

总的来说,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在中国古代史注的独立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一方面是使得史注开始独立于经注之外,成为史学中的一个重要部类;另一方面也使得史注开始注重自身体系的建构,形成了独特的发展路径。同时,裴松之在注释过程中,还运用一定的体例、方法以及剪裁、排比、整理等特殊的论断方式,在注文中隐含着自已的史学思想、历史倾向乃至政治意识,实现了其对注史当“有所发明”的要求,这也充分体现了裴松之《三国志注》的重要史学价值。

囿于学识所限,书中错误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方家指正!

张 宇

2016年6月于华侨大学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裴松之注释《三国志》的原因与背景	(9)
第一节 “嫌其略”与“总括前踪,贻诲来世”	(11)
第二节 社会背景下的政治因素考量	(13)
第三节 历史背景下的类似三国局面	(16)
第二章 裴松之《三国志注》的体例与方法	(22)
第一节 体 例	(22)
第二节 方 法	(31)
第三章 裴松之《三国志注》中的历史评论	(44)
第一节 论断之原则	(46)
第二节 论断之标准	(51)
第三节 论断之理论渊源与现实依据	(64)
第四节 论断之特点	(70)

第四章 裴松之《三国志注》中的史学批评	(78)
第一节 关于史书叙事的批评	(78)
第二节 关于史书体例的批评	(92)
第三节 关于史文表述的批评	(95)
第五章 谈《三国志》裴注尊魏抑晋的历史倾向	(100)
第一节 尊魏与抑晋在注文中的表现	(100)
第二节 抑晋的原因	(102)
第三节 抑晋的表现	(111)
第六章 寓论断于注释——《三国志》裴注表微	(119)
第一节 层层递进法	(121)
第二节 两两对照法	(128)
第三节 直引评语法	(134)
第四节 注评相兼法	(140)
结 语	(145)
附 录 《三国志》及裴注时误积微识小录	(153)
参考文献	(176)

绪 论

一、裴松之的家世与家族

裴松之，字世期，生于东晋简文帝咸安二年(372年)，卒于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451年)^①，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裴松之当出身于门阀世家，据《宋书》裴松之本传记载：“(松之)年二十，拜殿中将军。此官直卫左右，晋孝武太元中革选名家以参顾问，始用琅邪王茂之、会稽谢轺，皆南北之望。”^②从这句话可以得出两个信息：第一，裴松之起家官为殿中将军，而殿中将军之职在晋孝武太元年间往往是“以门阀居之”^③。第二，据文中“名家”“南北之望”等词可知，任殿中

① 关于裴松之生卒年，尚有其他两种说法：(1)余嘉锡认为，裴松之生于东晋升平四年(360年)，卒于宋元嘉十六年(439年)，详见余嘉锡：《余嘉锡论学杂著》，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99～500页。(2)陈健梅认为，裴松之当生于东晋海西公太和五年(370年)，卒于元嘉二十六年(449年)，详见陈健梅：《裴松之生卒年考》，载《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2期。

② 沈约：《宋书》卷六四《裴松之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98页。

③ 沈约：《宋书》卷四〇《百官志下》，第1249页。

将军的人也确实是出自门阀世家。据此我们可以推测裴松之的出身当属于门阀世家。又,《宋书》裴松之本传中还提到“舅庾楷在江陵,欲得松之西上”。可知裴氏与第一流大族庾氏有着姻亲关系,而能与第一流大族联姻,在十分注重门当户对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也必须是门阀世家,而且极有可能是一流的门阀。^①正是这种门阀的出身,才使得裴松之在注史过程中非常注意以子孙联注的方法注史,而这也正是后来南北朝史家著史过程中常用的子孙联传式史例。同时,这种门阀世家的身份也使得裴松之在历史评论中非常强调门阀自身的利益,并且具有鲜明的务实变通意识。

关于裴松之的家族,由于史料记载有限,仅知道裴松之五世祖为裴康^②,号为“八裴之一”,有盛名,官职为晋太子左卫率。惠怀之乱后,裴氏家族南渡,其后世系莫辨。直至裴松之祖父裴昧时裴氏始再显,裴昧为东晋光禄大夫。裴松之父亲裴珪,为正员外郎。^③至裴松之及其子孙辈,连续四代于史书中皆有传,史料记载才多了起来。如其子裴骅,受其父影响,亦重视史注,有《史记集解》问世,为著名的《史记》三家注之一。裴骅之子裴昭明传承家学,“少传儒史之业”^④,在礼学方面亦颇有造诣。裴昭明之子裴子野“家传素业,世习儒

① 关于裴松之世家门阀的身份可进一步参见逯耀东:《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33页。

② 据《梁书》卷三〇《裴子野传》“(子野)为晋太子左率康八世孙”(姚思廉:《梁书》卷三〇《裴子野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441页)推知。

③ 沈约:《宋书》卷六四《裴松之传》,第1698页。

④ 萧子显:《南齐书》卷五三《良政传·裴昭明》,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918页。

史”^①，亦为史学大家，与其曾祖裴松之、祖父裴骃并列为“史学三裴”。著有《宋略》一书，该书“叙事评论多善……兰陵萧琛言其评论可与《过秦》《王命》分路扬镳”^②。另外，裴子野与其曾祖裴松之一样，也曾集注过《丧服经》。可见，裴氏家族至少自裴松之以来，皆以儒学传家，经史并重。

二、裴松之的政治活动

从《宋书》裴松之本传中的记载看，裴松之一生的仕途较为顺畅，几乎没有什么阻滞：

年二十，拜殿中将军。……

义熙初，为吴兴故鄣令，在县有绩。入为尚书祠部郎。……

高祖北伐，领司州刺史，以松之为州主簿，转治中从事史。既克洛阳，松之居州行事。……

除零陵内史，征为国子博士。……

转中书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

出为永嘉太守，勤恤百姓，吏民便之。入补通直为常侍，复领二州大中正。寻出为南琅邪太守。十四年致仕，拜中散大夫，寻领国子博士，进太中大夫，博士如故。^③

裴松之一生仕宦长达五十余年，仕途较为坦荡顺畅，所历官职多达十余种，但大多非实权显赫之职。在裴松之长达

① 姚思廉：《梁书》卷三〇《裴子野传》，第442页。

② 李延寿：《南史》卷三三《裴松之传附曾孙子野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66页。

③ 沈约：《宋书》卷六四《裴松之传》，第1698～1701页。

五十余年的仕宦生涯中,先后参与了三件比较重要的政事,分别是:

——奉旨巡视

宋文帝元嘉三年(426年),在诛司徒徐羨之等人之后,宋文帝为稳定统治,“分遣大使,巡行天下”。其中裴松之的出使地为湘州。文帝要求使者“亲见刺史二千石官长,申述至诚,广询治要,观察吏政,访求民隐,旌举操行,存问所疾,礼俗得失,一依周典,每各为书,还具条奏,俾朕昭然,若亲览焉”。宋文帝亲自交代巡视大使出使期间的具体任务和细节,可见这件事情的重要性。裴松之亦不辱使命,不久即上疏条奏二十四条。这二十四条奏疏的内容现已不可知,但史称“松之甚得奉使之义,论者美之”^①,可知这二十四条奏疏与宋文帝令使臣“广询治要,观察吏政,访求民隐,旌举操行,存问所疾,礼俗得失”的要求是较为一致的,而这些要求所涉及的正是统治者对于治国理政的重视。之后裴松之在注史过程中颇为留意注释涉及治乱兴亡的历史大事,并且在其历史评论中也多有体现,当是与这段政治经历有着一定关系。

——奉旨议礼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礼法与礼制发展的重要时期,“五礼”制度即在这一时期开始逐渐定型。^②由于门阀士族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五礼”的实践功能愈发显得重要。但是这一时期礼制的实践还处在一个混乱阶段,经常会在礼制实践过程中出现疑问,如“庾炳之转彭城王义康骠骑

① 沈约:《宋书》卷六四《裴松之传》,第1701页。

② 参见梁满仓:《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五礼制度化》,载《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4期。

主簿，未就，徙为丹阳丞。炳之既未到府，疑于府公礼敬”。针对这件事，宋文帝“下礼官博议”。裴松之议曰：“案《春秋》桓八年，祭公逆王后于纪。《公羊传》曰：‘女在国称女，此其称王后何？王者无外，其辞成矣。’推此而言，则炳之为吏之道，定于受命之日矣，其辞已成，在官无外，名器既正，则礼亦从之。且今宰牧之官，拜不之职，未接之民，必有其敬者，以既受王命，则成君民之义故也。吏之被勅，犹除者受拜，民不以未见阙其被礼，吏安可以未到废其节乎？愚怀所见，宜执吏礼。”^①宋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可见裴松之对于礼学、礼制十分熟稔。除此之外，裴松之还参与了臧妃庙乐、议禁断私自立碑、元嘉立学之礼等关乎吉礼、凶礼、嘉礼等议礼之事。这对他在论史过程中特别注重以礼法原则作为评论人事的标准当是产生了重要影响。

——奉旨注史

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说道：“臣前被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国志》。”这句话有两个意思：第一，由“被诏”可知这并非纯粹的学术活动，而是一项政治任务。第二，“被诏”的时间即可视为裴松之正式开始注释《三国志》的时间。那么裴松之是何时获得这项命令的呢？据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末尾所题时间为“元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可知此为《三国志注》完成时间。而在《上三国志注表》中裴松之又说“自就撰集，已垂期月”^②。其中“期月”一词有一整月 and 一整年两个意思，根据情理推断，一整月之内很难完成这么

① 沈约：《宋书》卷五三《庾登之传附弟炳之传》，第1517页。

② 陈寿：《三国志》附录《上三国志注表》，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471～1472页。

一部字数达 30 多万,并参考 250 余种书目的繁复注作,因此一年应当较为合理。又,裴松之在注文中曾就袁谭不为袁绍守丧三年之事说道:“绍死至此,过周五月耳。谭虽出后其伯,不为绍服三年,而于再期之内以行吉礼,悖矣。”^①此处之“再期之内”为两年,由此可推知裴松之所言之“期月”确实为一整年的意思。因此,宋文帝命裴松之注释的时间当是元嘉五年(428 年)七月。需要说明的是,恰在这一年二月,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发生了剧烈变动,尤其是实力较为雄厚的大夏政权,因国主被俘,实力大损,整个政权已经趋于崩溃。这就使得之前勉强构成北魏、刘宋、大夏政权三方鼎峙的局面,此时已经难以维持。在这种情形下,如何适应三国鼎立局面解体之后的危机情形,确实是宋文帝君臣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而从以往相似的历史中寻找鉴戒,则未尝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这或许就是宋文帝令裴松之注史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裴松之的学术倾向与学术著作

裴松之的学术渊源由于史料记载有限,仅知道他“年八岁,学通《论语》《毛诗》。博览坟籍,立身简素”^②。但他的学术倾向根据史料钩沉,尚可略知一二,即大致可以断定,在魏晋南北朝儒、释、道三教合流和儒学玄学化这一学术大变动的背景下,裴松之的学术倾向基本上还是尊儒尊孔,要求保持传统儒学的正统地位。沈约对此论道:“臧焘、徐广、傅隆、裴松之、何承天、雷次宗,并服膺圣哲,不为雅俗推移,立名于

① 陈寿:《三国志·魏书》卷一《武帝纪》,第 24 页。

② 沈约:《宋书》卷六四《裴松之传》,第 1698 页。

世，宜矣。”^①其中“服膺圣哲，不为雅俗推移”即可清楚表明裴松之的学术倾向。裴松之在《三国志注》的注史过程中，也自然而然地流露出这种学术倾向。如曹魏时期崔林认为：

宗圣侯亦以王命祀，不为未有命也。周武王封黄帝、尧、舜之后，及立三恪，禹、汤之世，不列于时，复特命他官祭也。今周公已上，达于三皇，忽焉不祀，而其礼经亦存其言。今独祀孔子者，以世近故也。以大夫之后，特受无疆之祀，礼过古帝，义逾汤、武，可谓崇明报德矣，无复重祀于非族也。

对此，裴松之激烈地评论道：

臣松之以为孟轲称宰我之辞曰：“以予观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又曰：“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者也。”斯非通贤之格言，商较之定准乎！虽妙极则同，万圣犹一，然淳薄异时，质文殊用，或当时则荣，没则已焉，是以遗风所被，寔有深浅。若乃经纬天人，立言垂制，百王莫之能违，彝伦资之以立，诚一人而已耳。周监二代，斯文为盛。然于六经之道，未能及其精致。加以圣贤不兴，旷年五百，道化陵夷，宪章殆尽，若使时无孔门，则周典几乎息矣。夫能光明先王之道，以成万世之功，齐天地之无穷，等日月之久照，岂不有逾于群圣哉？林曾无史迁洞想之诚，梅真慷慨之志，而守其蓬心以塞明义，可谓多见其不知量也。^②

从这段话中可以明显感受到裴松之对于孔子的服膺，也明确

① 沈约：《宋书》卷五五《傅隆传》，第1553页。

② 陈寿：《三国志·魏书》卷二四《韩崔高孙王传》，第682页。

表明了他的学术倾向是尊儒尊孔。

裴松之的学术著作主要分为以下几类：一类是经学著作，经学著作目前来看仅存一部《集注丧服经传》，通过“集注”二字可知，这是一部集解式经注，这种集解式注释方式也正是裴松之所擅长的。一类是史学著作，史学著作则包括《史目》《晋纪》《三国志注》《宋元嘉起居注》《北征记》《西征记》《述征记》《裴氏家传》。此外，还有《宋太中大夫裴松之集》。^①裴松之的这些著作大多散佚，或仅留片段，如《史目》仅见于张守节《史记正义》中引用：“裴松之《史目》云‘天子称本纪，诸侯曰世家’。”^②唯《三国志注》流传于世。

① 关于裴松之的著述可进一步参见逯耀东：《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第234～236页。

② 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页。

第一章

裴松之注释《三国志》的原因与背景

宋文帝元嘉五年(428年),南北政权先后发生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是这年二月北魏俘获大夏国主赫连昌。历史证明,赫连昌的被俘,将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首先,这标志着大夏的灭亡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果然不到三年(元嘉八年,431年)即被北魏灭亡。其次,除大夏之外,北方地区其他割据政权皆国小力弱,难与北魏抗衡,北魏统一北方已然指日可待。再次,假若北魏统一北方,必然会与刘宋形成直接的对峙局面。最后,这种对峙局面,对当时实力稍逊一筹的刘宋政权来说,是极不愿意看到的,北魏谋臣崔浩即言:“南人闻国家克统万以来,内怀恐惧。”^①刘宋政权的这种恐惧,显然是察觉到了大夏灭亡后所带来的不利于己的连锁反应,所以也才有了后来元嘉七年(430年)的第一次北伐,而这次北

^①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二一,宋文帝元嘉六年夏四月癸亥,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872页。